



中国皇冠诗丛

第一辑

远去的纸鸢

刘小平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中国皇冠诗丛·第二套
黄神彪 栗原小荻 主编

远去的纸鸢
刘小平

出版：广西民族出版社
经销：广西区新华书店
印刷：广西区计委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36
印张：2.56
字数：57.500 千字
版次：1990年11月第1版
印期：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7—5363—0979—1 / I · 199
定价：2.00 元

皇冠诗人实力风采 的更大显示

——《中国皇冠诗丛》第二套总序一

吕进

在我看来，新时期的中国新诗（包括散文诗）留下的是三段式轨迹。

从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初期，是中国新诗发展的正题。它是由“归来者”和“朦胧诗”人领潮的。二者在表现方式和语言理想上虽有明显差别，但是在诗与时代、诗的理想光彩、诗的公民感这样一些诗学基本课题上，却有共识。正题阶段的中国新诗是传统诗美学的复苏与胜利，又是新时期中国新诗开拓艺术新径的发端。

舒婷有过这样的诗句：“也许我们的心事／总

是没有读者。”“归来者”和“朦胧诗”人的“心事”并不完全相同。如果说“归来者”从多年的磨难中走出来，向着新时代唱着自己的欢愉与信念，那么，“朦胧诗”人就在心灵上还没有从昨天的失望中完全走出来，他们对新时代的到来不那么愿意轻易相信，他们继续在用“黑色的眼睛”寻找光明。在艺术上，“归来者”运用自己习惯的诗笔大显身手，“朦胧诗”人却力求从审美困境中获得解脱。尽管有这些相异，但是二者在“为一切苦难疾呼”和“对个人的不幸只好沉默”上，在“说真话，抒真情”上却都继承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

正题阶段的中国诗坛出现了“两立式”架构：两峰对峙，逆向展开。应该说这是有长久渊源的。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诗》、《骚》就是“两立式”架构。在基本的美学追求的基础上，《诗》比较外向，审美对象往往是群体生活；《骚》比较内向，审美对象往往是个体人格。它们代表了中国诗歌的两种基本范式。作为一种美学走向，“朦胧诗”的名称是在一篇并不是批评舒婷等人而是批评“九叶”诗人之一的杜运燮的文章中提出的。这无异于从一个侧面提示人们去注意“朦胧诗”在中国新诗史上的纵的承接关系。也提醒人们，中国新诗坛也常常是“两立式”架构。张载《正蒙·太和》说：“不有两则无一”，“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两”是重要的诗学概念。在正

题阶段，“归来者”和相同路向的诗人的创作实绩更大，而“朦胧诗”人和相同路向的诗人的探索精神的影响更大。二者互为渗透，互为补充。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诗坛的原始同一失衡，它以正题作为发展起点而进入反题。

被称为“第三代”的诗人作为传统诗美学的对立面而显现。

“第三代”，不是一个时间概念，也不是一个年龄概念。虽然在时间上，他们比“朦胧诗”人出现得晚；从年龄看，他们大都是青年人。“第三代”是在“pass 北岛、舒婷”的呼喊声中披挂上阵的，它是完全不同于“朦胧诗”的诗歌现象。

八十年代的中国诗坛有一种肤浅、浮躁的“换代”热。这里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把玩涌进中国的西方各种流派。八十年代的中国新诗在这个方面匆匆忙忙地几乎将西方从文艺复兴以后的诗歌各种流派都（常常是走样的）复写了一遍。其二，诗歌成就感上的轻浮。急于成名和粗暴否定前辈和同辈从来就是孪生兄弟。一切自今天开始、从自己开始，“闻”见“一”个别人的名字都嫌“多”的“闻一多”现象成了一种时代病。两个原因有内在联系。于是就出现了试图以宣言（而不是作品）在诗坛上独树一帜的“诗人”。

从总体把握，“第三代”确实是新的“一代”。假如说，“朦胧诗”是与西方现代派诗歌平行发展的“不约而同”的诗歌现象，“第三代”则是直接从

西方后现代派那里获得发展的启迪与动力。

关注人自身，这本是二十世纪一种世界性文化现象。“第三代”努力想用原生态语言写出普通人的生命体验因而自有其价值。“朦胧诗”人对人的关注是社会批判意义上的，“第三代”对人的关注是个体生命意义上的。前者更关注“我做什么”，后者更关注“我是谁”。

正题阶段是中国新诗对历史的沉思，反题阶段是中国新诗对自身的沉思。“第三代”出现在第二种反思的年代几乎是一种必然。尽管“第三代”在中国人文环境中生硬模仿西方后现代派带来了和时代的割裂，尽管“第三代”宣言多于作品，但是“第三代”实现了与传统诗美学的大碰撞，而不同的诗美学的碰撞更有利于创新的艺术氛围的形成，更有利于诗的自身反思的深入。

从 1986 年开始，诗坛渐入沉寂。

沉寂诚然是一种“退烧”，但沉寂未必不是一种转机的显示和发展的前奏。

重社会、重理想、重群体、重使命的诗实现了自否定，非社会、非理想、重个体、重生命的诗也实现了自否定，于是，中国新诗迎来自发展的合题——将正题和反题两个阶段的积极因素、有生命力的因素在更高基础上统一起来。合题阶段在外貌上似乎又回到了正题阶段，其实，它体现的是中国新诗的螺旋形上升。走向和谐与成熟是合题阶段的总体特征：正题阶段的使命意识和

反题阶段的生命意识的和谐， 路向选择的成熟。
中国新诗正生活在合题中。

继续清除曾长期流行的非诗程式， 同时又继续清除将诗的价值看成仅仅是一种内部价值、 符号价值、 超功利的自我价值的理论与实践， 实现文体自觉与时代自觉的和谐， 是一切有识之士正在作的事情。

如果新诗的外在生存环境有所改善， 合题阶段将有好收成，并将成为新的发展循环的正题。

然而外在生存环境迄今还不太令人乐观。拜金潮使得最缺乏通俗性、 消遣性、 装饰性的诗歌处境堪忧。即便是知名度甚大的诗人往往也对着“出书”二字摇头叹息。

所以， 黄神彪、 栗原小荻主编的《中国皇冠诗丛》 继第一套（二十本）之后现在又要出第二套（二十五本）， 这个消息实在好得超出了意料。两位年轻诗人完成了中国新诗及散文诗坛上的一大盛举， 真是“后生可畏”。我愿意在这篇序言中向他们表示敬意。

《中国皇冠诗丛》第二套的作者阵营是可观的： 晚雪、 韦其麟、 纪鹏、 李发模、 塞风、 钟声扬、 王宗仁、 蔡旭、 黄神彪、 谢克强、 翁新东、 栗原小荻、 杨川庆、 李杜以及一批初露头角的诗人。作者中少数民族诗人占了相当的数量， 小说家蓝怀昌也捧上了诗作（这种情况现今已不鲜见， 画家黄永玉、 小说家贾平凹、 戏剧家苏叔阳

都是优秀的新诗诗人)。和第一套相比，这套《诗丛》还包容了好几个长篇作品：四部长篇散文诗和一部长诗的一次性推出，必将吸引诗坛的注意。我相信，在合题阶段出现的这套有特色的《诗丛》对中国新诗和散文诗的走向和谐与成熟一定会作出自己的贡献。

此外，这套《诗丛》还包括一本诗论集《寻找辉煌》，体现出两位主编的脱俗风度，使我这个学搞诗论的人感到亲切。《寻找辉煌》的作者是中国新诗研究所毕业的研究生，这就使我的亲切感加了一倍，我想向关心这位昔日的学生的人们表示谢意。

我还注意到《中国皇冠诗丛》是由广西民族出版社推出的。如果中国有十个令人尊敬的广西民族出版社，新诗的外在生存环境就会有较大改善了，新诗就在更快地走向和谐与成熟上更有物质保障了，我想。

1990.11.2于重庆

诗：语言牢笼里的 自由魂

——《中国皇冠诗丛》第二套总序二

李洁非

我在《小说的诞生》中写道：“纯粹的诗与其说近于语言艺术，毋如说更近于音乐，尽管这种音乐是自语言中形成而被称为语言的一部分。”

希腊人早期的音乐与诗歌有着密切的关系。没有不需要唱的诗，也没有不属于声乐的音乐。用四音步节奏合唱的酒神颂，既是诗又是音乐。阿尔基洛科斯和西摩尼得斯都是同栏的诗人兼音乐家。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中，歌唱的部分(*mele*)要远超过对话的部分(*metra*)。现代意义上的器乐，在古希腊并未发展起来；正如阿贝

尔特指出的，曲调的规律是由人的嗓音决定的。
(见塔塔尔凯维奇《古代美学》)

依上所述，则诗就不仅仅是与音乐相近，而简直可以说是音乐的起源。在中国，古人亦持有类似的看法。《毛诗序》称：“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

然而，我们所欲揭示的诗与音乐的亲近关系，主要还不是指其历史的渊源，而是一种精神上的一致。

我于诸艺术中，最景仰也最崇尚音乐。唯有这种艺术，最不附加条件而直接作用于人，最易近于康德所谓“无目的合目的性”的纯粹美。它越过了感官与理性的界限，独立于时间、空间之外，打破了地域、民族、语言这种种的文化桎梏；它既是十足原始的官能力量，又是最抽象的可穿透宇宙奥秘的智慧之光……总之，音乐这门艺术，通体都透露着那种无羁无绊的自由精神！

在我看来，诗的艺术正堪比为语言艺术中的音乐。尼采关于悲剧的令人着迷的分析中，第一次把艺术精神的基本对立归诸狄奥尼索斯与阿波罗的对立，即音乐力量与话语力量的对立。倘允许我引用尼采这一原则，那末我将指出，语言艺术中狄奥尼索斯与阿波罗的对立，可以解释为诗与小说的对立。

小说这一叙事艺术无疑受着太阳神的庇护与指引，它必须诉诸建构，注重逻辑、完整、清晰

和均衡，相反地，那些不驯服的随心所欲的自由意志和感情冲动必须受到抑制。小说存在的基本前提是井然有序的结构状态；尽管虚构原则赋予小说语言的叙事变形功能，但这种变形从不是毫无限制的，它难以割断与故事要素、文体模式的联系，某种意义上，小说作者的语言直觉灵感是次要的，文本的叙述类型和叙述逻辑方是真正的决定性因素。

在其建构性质的小说的彼岸，便是含着解构意味的诗。当小说不得不钻进语言牢笼设计它的叙事迷宫时，诗却正致力于破坏这一语言牢笼。

的确，就其作为语言艺术而言，诗本质上从不是语言规范的忠臣顺民，而是一个天生的反叛者、破坏者。普通语言乃是一项契约，是社会成员之间为了可理解的信息交换而达成的妥协。但纯粹的诗既不为此目的发生，亦不为此而存在；诗在其最原始、最单纯意义上，乃是发生于发音器官的和谐远大！这一运动带来了特殊的美感，也显示了语言那非社会性的、生命冲动的本质。

所以，在诗中我们目睹了人类语言所有反常规的极端例子——古今中外俯拾皆是。诗人们全然不顾所谓词与物的同构关系，蔑视语法的、句法的语言程序，超越字典所规定的词语的“意义”，肆无忌惮地挣脱镣铐而大跳其语言之舞。我以为，诗的语言最近似于儿童语言。儿童在运用语言写作时，因为尚未受文本、语法、成语典

故等语言的文化因素的影响，便保持了人类语言的直觉；在对单词的意会，对词组的组合关系，对语言的奇特意识和联想上，均大大迥异于成人。一个天才的诗人亦正如此。

由于上述原因，在语言艺术历史的每一次革命中，几乎都是由诗扮演了前卫角色。不独现代主义文学如此，“五四”如此，中国新时期文学如此；楚辞何尝不是汉赋的先声？长短句何尝不是戏曲小说的先声；这实在是由于诗无论何时何地都代表着语言的自觉意识，都表现着语言的生命冲动，一言以蔽之，诗将永远是语言牢笼里的自由魂！

确乎，“文各有解主，各有时代”，如自盛衰而论，今之诗运确不如古代——这是以历史、以读者需求的状况评价艺术的地位，有以时势英雄之嫌。显然还有另外的尺度，即从艺术精神，艺术创造力和艺术美学意义来评价它，可以说是一种纯艺术的眼光，其结论往往与前者大相径庭。我欣赏“皇冠诗丛”这个名称，不惟喜其富于气魄，尤贵其自信之心。我个人毫不怀疑，尽管诗盛及一时的年代似已过去，但它作为语言艺术之冠的地位仍无改变，且不会改变；如前所述，这是诗的艺术本性所决定的。因此，可怕的并非诗运式微，而是诗人受着世论的冷暖而失掉了自信之心——对于艺术而言，这种动摇才是致命的。

使人宽慰的是，《中国皇冠诗丛》这么一套

规模巨大的连续性的丛书的出版，可以证明上述动摇并不存在。但我仍然要说，正如每个读到这套丛书的人赞叹的那样，广西民族出版社的负责人和编辑为此所做的一切，也富于卓识也堪称功德无量；同时，我还听说这家出版社在支持纯艺术、学术著作的出版方面是一贯的，这对当今文化的意义显然不言而喻。

主编黄神彪兄、栗原小荻先生嘱我作篇序，作为小说研究者，诗本非我所长，上述的话，权作对于诗界朋友们的希冀与祝福。两位主编与我是同龄人，看见他们这么年轻就做出引人注目的工作，不由满心的钦羡。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四日，北京

目 录

- [1] 吕进 / 皇冠诗人实力
风采的更大显示 (总序一)
[7] 李洁非 / 诗：语言牢笼
里的自由魂 (总序二)

第一辑 远去的纸鸢

- [3] 告别
[4] 铁索桥，颤颤悠悠
[5] 那一架葡萄
[6] 界河

[8]	老牛
[9]	太阳和月亮
[10]	航海
[11]	夏夜
[12]	牧童
[13]	风筝
[15]	海之恋
[17]	屋后那片青青的小松树林
[19]	初涉
[21]	春天的歌谣
[22]	海
[23]	蒲公英
[24]	学会适应
[26]	缺陷
[27]	雪线
[29]	警笛
[31]	孩子与河
[33]	影子
[34]	责任

第二辑 任性的孩子

[38]	海之画
[39]	黄牛
[40]	溶洞

[42]	云雾
[43]	冬眠
[45]	长途客车
[46]	鹰
[47]	海滨浴场
[49]	黄鹂之死
[51]	漂泊者
[52]	窗
[54]	血
[56]	名医身后事
[58]	丑角
[60]	风
[62]	同情
[64]	纤夫
[66]	海市蜃楼
[67]	恶运
[69]	猎狼者
[71]	早晨发生的故事
[72]	眼看着自己从娘胎里分娩
[74]	塑造
[76]	野渡

第一辑

远去的纸鸢

以为从此再不能相逢
不能相逢是人生的真谛

——《告别》